

# “万卷书”上 又添新华章

## ——《乌罗教育志》之浅见

吴恩泽

“万卷书”是梵净灵山的一个十分耀眼也十分独特的景点:一片片厚薄不一如书如籍的石块,参差重叠直而红云金顶,令人肃然。据传这是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返回大唐时,刻意绕道梵净山拜谒未来佛弥勒菩萨,白龙马偶失前蹄,将所有取回的东西方经典遗落所致。当然这只是灵山的一个象征。她无法取代的方式,告诫世人,梵净山不仅仅在自然生态上是天下“众名岳之宗”,而且还是你万难想像的一架浩渺无际的培育人类文明的温馨摇篮。

这不,就在2026年得意的春风刚刚沿着辰河、酉水溯流吹拂梵净山下每一个城镇、乡村的时候,就在远古的踏踏马蹄声在“万卷书”之外。距离响响的时候,一部教育史诗般的鸿构《乌罗教育志》横空问世了!

在简介该书之前,我们得先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乌罗以及这个远天远地的乌罗,有什么必要或为什么必须呕心沥血来完成一部开洪荒之先的教育志的初衷,铺陈铺陈,让读者诸君破疑解惑,有所识见。

乌罗,梵净山东麓的一个偏远小镇。距离县城松桃,以及临省临县的县城秀山、印江,都在一百多里之外。距离铜仁市区及凤凰机场遥至两百多里。就是这么一个穷乡僻壤,在明永乐十一年,即1413年,明朝政府为了川黔湘三省商贸通达,派遣十万精兵在梵净山麓大动刀兵,改土归流。乌罗之名应战争之运而响震一方,为明王朝贵州开省所立堂堂八府之一。官学(当时称为儒学)在乌罗首创,梵净山区域芳华独现。此后,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不管时势如何动乱祥和,或书院,或私塾,或学堂,或民办,或扫盲,或幼教,或成人教育,或夜中,或初中,或高中……几百年来教育形式纷纭。虽说兴亡不定,盛衰有凭,但教书育人的根脉却总是生生不息,争芳斗艳;几百年来自僻乡走向五洲四洋的人才也是层出不穷,令人拍案。

《乌罗教育志》在乌罗小镇开花结果,开全省甚至全国乡镇教育书立志书之先,既是天意,也是因果。

《乌罗教育志》共分十一章三十八节,煌煌六十八万字数。从1414年至2024年,610年的教育设施,教材教法,累累硕果在华夏精彩添异,书香绕梁弥漫一个个小

小荒村……皆可可见,皆可所闻。一句话,这部教育志书填补了六百多年来梵净山文明摇篮培育人文婴孩一路前行的空白历史,让“万卷书”再显红云罩鼎,功在千秋。

而且,这部鸿篇巨制的呱呱坠地也令人匪夷所思。没有所谓的志书办,没有专门的脱产搜集资料和编纂的人员。他们就是凭借着两点通天通地的见解,开始了历时三年的巨大工程,一是镇政府对乌罗教育历史奠定的基础在现实改革开放中影响深远的认可,二是乌罗百姓对长时期教育哺育下的文明生活的认可。就是这两个“认可”,让这部梵净山区域教育史诗般的著作应时踏马而来。说白了,就是在镇政府公务员的倡导与组织下,在成百上千的志愿者参与与关注下,在有志者的资料搜集与精心编纂下,《乌罗教育志》竟然在无声处惊雷乍响,问鼎苍穹。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肯定一部乡镇教育志的完成?这得从中华民族创建文化之始的老祖宗仓颉说起。大家都知道仓颉造字,他苦心孤诣要造出这些流传千古的汉字,在这个先知的脑海里不知道涌流起多少次裂岸的波涛。因为他想把所有那世以及前世先知的智慧传之于后,为代代中华族裔逐渐成长为万物之灵长缩短距离。口口相传达不到,而且人死烟灭。于是克服千难万险,创建了为教育而生的文字。是的,仓颉造字不仅仅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教育发展的唯一重要的转折点。没有这个教育的重要转折点,何来中华民族文明的里程碑。《乌罗教育志》的出版,不仅仅是对梵净山区域教育历史的记录,更是对梵净山区域教育精神的传承和教育经验的总结,以及对梵净山区域教育未来的启迪。

一个天外的乌罗小镇,六百年教育为什么一直遥遥一马当先?我在仔细阅读《乌罗教育志》的时候,醍醐灌顶一般明白了书中的原旨要义,小结为如下两句话:第一句:前贤如炬,后辈承光;第二句:以爱育心,以智启慧。

《乌罗教育志》出版的恒久意义便不言而喻了。

在此,为《乌罗教育志》的出版鼓与呼!为那些因为《乌罗教育志》付出了心血的编纂者以及众多志愿者点赞!

# 简淡皎然

杨村

唐代诗人中,像皎然那样简淡的不乏其人。王维、孟浩然、裴迪、柳宗元,都属此类。今天,我为什么说起皎然来呢?因为我刚刚又读了他的《寻陆鸿渐不遇》一首,联想起丘为的《寻西山隐者不遇》,贾岛的《寻隐者不遇》诸首。

想想,古人的生活是很有意思的。在家呆久了,想起自己的好友,便贸然前往,去寻友人聊天、话酒、酒话,吟诗作对——当然,这也只是有闲阶的日子。换作是“带月荷锄归”的锄劳功烈者,哪来如此闲情雅致?因为通讯的阻隔,兴致勃勃而去,友人常常不在家,关门闭户,只好看了看友人生活的环境,闻闻友人的气息,或者向邻人打探一下友人的行踪。若是山水清秀,赏心悦目,就会睹物思人,诗兴勃发。回到家来,吟下一首“不遇诗”,以寄托对友人的思念之情。皎然去访问陆鸿渐时,邻人说他“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贾岛访友时,童子也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丘为则洒脱一些,写道:“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游兴已尽,赶快回家,我何必非要等到这隐者不可?后人老村去镰刀湾访老贵扑空,回来则是“老贵何所之,倚木问山阿”。然而山阿无言,只好悵

然而返。老村是“为赋新诗”,但悵娇情一回罢了,要不为什么不早先手机一下?

陆鸿渐是谁?陆羽也。陆鸿渐小皎然二十七岁,属于忘年之交。可以说,皎然是陆鸿渐生命中的贵人,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得到皎然的悉心呵护、帮助,成了一代茶专家,写下了中国第一部茶专著《茶经》。他对茶的试验和观察基地,正是皎然住持的寺院茶园,生活上也依托皎然提供的方便——严格追究起来,恐怕还有几分涉嫌假公济私。写《茶经》的知识、材料的积累,也很多受益于皎然。

提起古人通信闭塞的生活方式,想说句题外话——我幼年时跟随父辈转山,如果有同道在后面,远隔一段路程。每到一个岔路口,他们总会折一枝树丫,或打一个草结,指向去路,跟随的人就不会迷路。就像如今的路标,或者导航系统。古人的方式,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要比今人诗意和浪漫,并赋予人无限的想象力。

顺便说,皎然是唐代最杰出的诗僧,且精通茶道——注意,是“最杰出”。他的俗姓为谢,是南北朝时期杰出诗人谢灵运第十世孙。祖孙俩相隔三百四十五年。

# 深研地方文献, 增强文化自信

## ——读谭德兴《贵州地方文献与文化研究》

安亮宇

贵州地处西南边地,自古被视为“蛮荒之地”。然山川虽阻,未尝阻隔文明之交汇;族群星布,反而孕育文化之斑斓。贵州的儒学文化发展起步甚早,可追溯至汉武帝时期。然而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其传播与影响在贵州呈现出凝滞的发展状态。直至近代,以遵义郑珍、郑知同、黎庶昌、莫友芝等人为代表的贵州儒学大家打通了从边缘到中心的儒学之路,标志着贵州儒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兴起之势,并留下了诸如沙滩文化等众多宝贵的贵州地方文献与文化。

贵州地方文献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学术价值较高,是在国家主流文化传播、多民族智慧共举的历史动力学中,不断层累、深化的知识谱系,其中蕴含着贵州人独特的鲜活的精神世界。谭德兴教授新著《贵州地方文献与文化研究》(贵州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是对贵州地方文献与文化发展的整体审视,分别从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家族文献等不同文献类别入手,深入探讨其与贵州文化发展的联系,同时还关注游宦文人、入黔湘人等不同群体对贵州文化的书写与影响。这种多维度、多层次切入的研究方式,立体呈现了贵州地方文献与文化的丰富图景,是作者多年来在此领域深耕的重大成果展示。该书还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贵州地方文献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其内涵、特点、价值及影响。作为一名生于斯、长于斯的贵州人,捧读此书,不可谓不欣喜,也不可谓不倍感文化自信。

### 一、体大思精:立足文化自信,提升贵州文化话语权

自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对于贵州地方文献与文化的研究便已开启,至今已走过600多年的漫长道路,取得的学术成果较为丰硕,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例如,在文献整理方面,缺乏对贵州地方文献全面系统的梳理,也缺乏一部完整的贵州地方文献总目;在文献研究领域,因受研究者学识与研究领域所限,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历史文献或文学文献等单一类别,呈现出零散、片面的特征,缺乏对贵州地方文献整体脉络的系统性观照与跨类别贯通。基于上述因素,谭德兴教授以开阔的学术视野试图对贵州地方文献与文化进行一次审视、探索,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界原有研究的一些不足,为进一步拓展其相关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新著立足文化自信,紧扣各类别地方文献与贵州文化发展之关系,体大思精,打破了长期笼罩在贵州文化研究上的“边地—中心”单向度视角。作者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将贵州文献置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交汇点上,进行审视,以期提升贵州文化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话语权。本书通过贵州地方志等历史文献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等研究著作,对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和当前的贵州地方文献研究情况进行概述,梳理出贵州文化发展的清晰脉络。在历史文献中追本溯源,可以发现,贵州在明代“十三省”中建省最晚,发展时间最短,而文献与文化的发展却最快,这是贵州文化自信的基点。其中原因该著作将其归为以下三点:其一,移民的影响。移民现象带来优秀的家族文化,可以直接提升边省地区的地方文化发展水平。其二,学校教育的发展。其中,明清时期的书院成为儒学传播的主要场所,其选址、建筑、园林景观、研习内容等方面都具有深厚的儒学意蕴。良好的教育环境、优良的师资力量,是培养文化人才的重要保障。其三,个人的勤奋努力。个人的天赋和勤奋,再加之良好的教育环境与文化底蕴,想在西南边省成为文化名士似乎也并不很难。

本书以表格的形式,直观呈现出贵州建省后经、史、子、集、家族五大类文献快速发展的情况,其中集团文献以诗集最多,而作者分布以省城贵阳居多。作者还对贵州地方文献的作者进行细致分类。其一,本土作者,即籍贯为贵州的文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省外其他地区为官或游历的人士,如朱启铃、徐如澍、国际华等;一类是在贵州为官或居住的贵州籍人士,如郑珍、宦懋庸、孙应鳌、谢三秀等,其著述主要涉及贵州本土内容,是贵州地方文献研究的重点。因此,本书也不遗余力地分章对各重要文化名士的著述进行引述、解读,旨在以小见大,窥斑见豹,体悟贵州之山水人文如何滋养本土作家创作,认识贵州文化的发展特质与动因,从而增强文化自信,为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提供助力。其二,省外客籍文人。又可分为长期在贵州居住的文人和前往云南、四川等地,途经贵州的游宦文人。而正是这种省内外文化的互动与交融,才直接加速了贵州文献与文化的发展,进而提升贵州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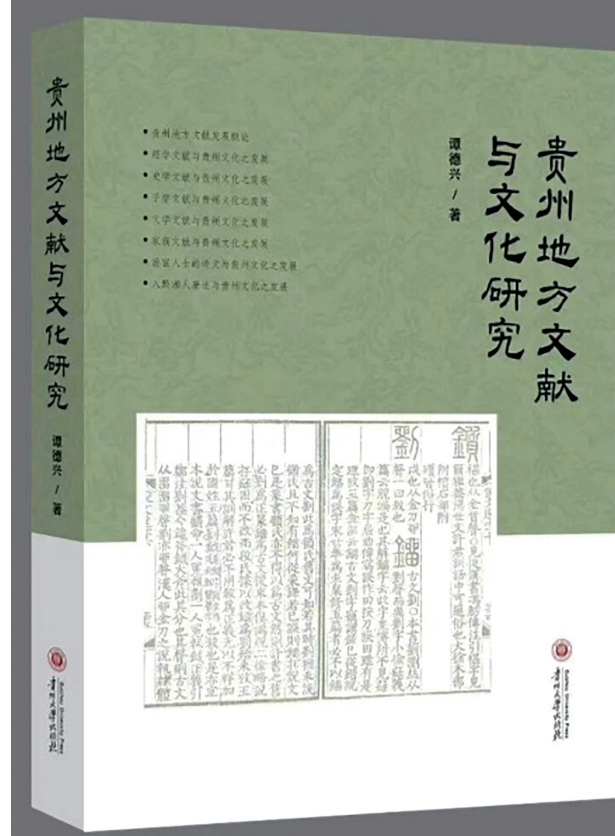
此外,本书还突破了传统地方文献研究往往偏重汉文典籍的局限,将少数民族的文

学、文化与图像文献纳入考察范畴,拓展了对贵州文化的整体性认知。该书第四章《子学文献与贵州文化之发展》第二节聚焦清绘本《黔省诸苗全图》进行分析研究,颇具创新,也体现出作者研究视野与格局的宏大。作者指出,《黔省诸苗全图》的叙述视角是站在封建统治立场上,以化服观视苗族生活及文化,但在保存苗族文化资料上有积极作用,可为进一步探析苗族的来源、民族融合过程、文化发展演变以及贵州文化发展动因等发挥作用。我们从中可以领会,贵州的文化自信,既源自郑珍、莫友芝等西南巨儒从边地通往中心的卓越之路,同样也深植于贵州本土各民族世代相传、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与艺术创造之中,有力地论证了贵州地方文化内在的多元性、互动性与创造性。

### 二、方法创新:多维度切入,呈现贵州立体文化生态

新著按文献类型分章展开论述,分别探讨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家族等不同类别的文献与贵州文化发展的内在关联,以及游宦文人与入黔湘人对贵州文化发展之影响,比较全面,在方法论上展现了高度的系统性与创新性。在撰写模式上,谭德兴教授多采用“文献门类+文化群体+重要成就”的分析方式,呈现出立体、生动的贵州文化生态。

其一,以文献类型为经。本书的特色在于按经、史、子、集、家族文献分章节,系统梳理各类别贵州文献的发展概况,揭示出各类文



献在黔地发展的路径与成就。贵州经学是儒学南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于贵州儒学沃土中发现勃勃生机,指出东汉时期尹珍游学中原,学成后回贵州及西南地区教授儒学,为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教育与文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贵州建省后,经学教育的广度与深度十分显著,特别是贵州的家族文化,十分重视儒学与经学教育,为贵州儒学与经学的高水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文献支撑。而黎庶昌、郑珍、莫友芝等西南巨儒在经学、文学、文献学、图书收藏与刊刻等方面的卓越文化贡献,也可与此一阶段之中原儒学者相比肩。晚清贵州经学蜚声海内外,达到最高水平,贵州省内形成了影响全国的经学中心,在治经人员和经学著述上均有所体现。

贵州史学文献发展水平较高,著述丰富,类型多样,其中一方志编撰数量之多和取得成就之大享誉海内外,是历代中原文化与西南边省文化密切互动、交融之产物。本书在史学文献章节重点聚焦贵州方志编纂与史学发展,咸丰《兴义府志》中的竹枝词,探讨了贵州地方志编纂的发展历史以及史学与文学的互动。谭德兴教授对方志研究颇有见地,如《贵州方志史学编纂体例之嬗变及其文学意义——兼论史学与文学之互动》《从道光〈平远州志〉看晚清贵州文艺志的儒学色彩——兼论史学与文学之互动》《方志文艺志散文文体的编纂及其文化意蕴——以贵州旧志为考察中心》等代表作均发表在学界重要研究刊物《中国地方志》上。新著以此探究贵州的史学文献,功底扎实,论述精湛,是本书的亮点之一。此外,贵州的子学文献、文学文献、家族文献也是贵州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具有较强的贵州地域特色,发展水平较高。其中,文学文献尤为丰硕,影响深远。如黎庶昌、陈垣等人的诗歌创作东传日本,产生广泛反响,成为贵州文学走出国门的重要标志。限于篇幅,兹不逐条详述。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新著对贵州历代文献进行了多维度的梳理与研究,同时对那些致力于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文化先贤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论述,

读之无不令人倍感文化自信。

其二,以人群活动为纬。贵州地方文献与文化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省内外文化名士的积极推动。本著系统梳理了从汉代郡文舍人键、尹珍,到明代播州杨氏、王阳明,直至近代“沙滩文化”代表人物等历代重要学人与群体对贵州文化建设的巨大贡献,深入剖析本土文人、游宦文人、家族文人以及入黔湘人等不同群体在文化创造、传播与融合中的重要作用,凸显文化发展中“人”的能动性。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既有宏观视野的观照,如多数章节均以表格的形式全面梳理了贵州重要文化人士的著述、籍贯、官职等信息;又有微观层面的个案分析,如作者花费大量笔墨为我们论述了洪启中、郑珍、宦懋庸、孙应鳌、谢三秀、花溪周渔璠家族、铜仁徐氏家族、何景明等人的文献成就与文化创造,从而在点点结合中构建起立体而饱满的贵州文化图景。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族文化一直是近代贵州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当中,遵义沙滩文化家族尤为突出。而作为贵州铜仁人,笔者对全书铜仁徐氏家族文献与文化的论述部分最为感兴趣。其中《从〈全黔诗萃〉看徐家的诗学活动》一文从文学角度出发,写得极为出色,介绍了铜仁地区当时的文学发展水平。

首先,作者从徐家的行迹与作诗活动展开论述,按文学批评的方式将其诗歌创作分为羁旅行役的感物与观风、居家生活的叙述与记录、社会现实的实录与批判三类,较为详细地分析徐家作品的内容与特色,其诗学创作不仅是个人人生经历的写照,也是晚清中国社会之实录,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其次,作者又对徐家追求精益求精的改诗现象进行论述,从徐家对自己诗歌的修改和徐家对他人诗歌的修改两个方面展开举例,依次分析,体现出徐家高超的诗学水平,展现了铜仁诗人的艺术成就。最后,作者立足徐家对《全黔诗萃》的编纂与其中蕴含的文学批评思想,详细分析其编纂目的、文学批评思想、文学史意义,指出《全黔诗萃》中“大量的论诗、品诗、评诗等资料,体现了清代诗学批评的丰富内涵,对进一步研究贵州区域文学与文化,以及明清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本书这种多维度切入的研究方式,立体呈现出贵州文化生态的丰富层次,使研究超越了静态的文献罗列,动态地还原了文化生长的复杂土壤。阅读该著,不仅是一次严谨的学术追溯,亦在字里行间完成了一场富含审美意蕴的文化体验。

### 三、价值深远:奠基学科研究,推进当代贵州文化发展

一脉土韵一脉土的精神基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使命。谭德兴教授新著《贵州地方文献与文化研究》的出版,不仅具有学术本身的价值,更展现出超越学科本身的综合价值。

作为首部对贵州地方文献与文化展开如此全面、深度整合研究的学术专著,本书不仅填补了贵州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更以多维度的视角和扎实的考据,构建了一个贵州地域文化研究的阐释体系。通过对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家族文献等不同门类的系统性梳理,以及对本土文人、游宦文人、家族文人与入黔湘人等不同文化群体作用的深入探析,本书突破了既往研究中常局限于单一文献类型或特定群体的视野局限,从整体高度把握贵州地方文献,为贵州地域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与理论基石。另外,对贵州地方文献与文化的深入研究,亦可以兼顾贵州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推进家族文化、乡贤文化、民族文化以及近年来提出的贵州“四大文化工程”等的集群研究,进而提升贵州文化的当代影响力,回应乡村振兴、文旅结合、民族团结等当代议题。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贵州读者而言,这部著作还具有文化层面的情感认同价值,为身处地域文化认同模糊的当代贵州人,提供了身份认同与情感依归。它以严谨而不失生动的学术话语,依托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论证了贵州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贡献。读者可以清晰看到:儒学、经学如何在黔地萌芽、扎根并结出“沙滩文化”这样的硕果;不同时代的文化名士、家族群体如何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与创造;多民族文化如何在这里碰撞、交融、共生,从而为凝聚文化认同、激发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有力的精神支撑。

总而言之,谭德兴教授的《贵州地方文献与文化研究》是一部体大思精、方法精湛、价值深远的学术力作,对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迈向成熟具有重要意义。而该著之于贵州读者,同样意义深远。它不仅告诉我们“从哪里来”,更以其宏大的格局与深邃的思考,启示我们应秉持何种精神气质与文化“向何处去”。它让我们看到,贵州的地方文献,从来不是沉默的故纸堆,而是跃动着历史脉搏、闪耀着民族智慧的鲜活生命体,等待着新一代学人去打开、对话与传承。